



杭州月志

HANGZHOU YUEZHI

2019 第 07 期 | 总第 43 期



记录发展
传承历史
资世垂鉴
服务大局



2019 年第 07 期 | 总第 43 期

(浙内准字第 A080 号)

主办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杭州市地方志学会

杭州月志编辑部

主编：蒋文欢

副主编：阮关水 金利权

执行主编：冯跃民 马琦敏

编辑：郦晶 王惟惟 吴铮

编务：吴陈英

特约摄影：狄东杰

地址：杭州市解放东路 18 号市民中心 C 座 1511 室

邮编：310026

电话：0571-85253682

邮箱：29100390@qq.com

杭州地情网：hzfzw.hangzhou.gov.cn

制版：浙江都市快报控股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开本：889×1194 1/16

印量：1200 册

CONTENTS

目 录

特载

- 01 对历史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⑥ / 盛玉雷

杭州记忆

- 02 全省首条铁路——江墅线的史事 / 祝一帆

武林探微

- 06 别把徐村叫九溪 / 袁长渭

志里寻踪

- 10 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阶段与发展分期 / 陈凯 刘宇琪
14 余杭古代市镇发展变迁述论 / 高建华

方志动态

- 22 【上级动态】
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第二届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
圆满闭幕
第六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系列会议等“三会”在吉林市举办
- 25 【市级动态】
市政府办公厅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专题学习讲座
“浙”里相约，“志”里看杭
- 27 【区县动态】
上城区加强区志编辑部分纂业务培训
上城区召开《南宋临安皇城篇》专家评审会
滨江区召开年鉴撰稿人员业务培训会
萧山一志一馆记录凤凰故事



《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想什么——凤凰村农民访谈录》出版

《余杭乡镇企业志》出版

保护历史文化 传承历史文脉——二轮修志开展后余杭古籍（旧志）整理成果

杭城新事

- 31 全省首条穿越地铁的综合管廊全线贯通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在萧山举行
- 32 2019 年杭州国际音乐节举行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首届数字经济与电竞产业高峰论坛在萧山举行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有限开园仪式
- 33 2019 年侨界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2019 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召开
2019 年之江杯全球人工智能大赛启动
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
- 34 2019 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杭州举行
杭州主城区内钱塘江货运码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019 年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在杭州举行
“非浙 A 急事通”措施实施

对历史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⑥

□ 盛玉雷

水有波而明其流，车有辙而后可循。历史之于国家民族，犹如记忆之于个人。一个人丢失了记忆，就丢失了自我；国家民族丢失了历史，也就丢失了现实和未来的依凭。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强调“要坚持正确历史观”，主张“对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告诫“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指出“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以史正人、以史化风，在当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有人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对这样的灵魂之病，还需彻底祛除病灶。荧屏上，民族罪人被演绎成风度绅士，时代楷模却被塑造成道德有亏，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被矮化成“宫斗”“权谋”；网帖里，有人调侃污蔑英雄人物、革命先烈，编造篡改党史、国史、军史；生活中，“精日分子”出没，出格举止挑战底线……无论是所谓“重新评价”的虚无主义，还是所谓“还原真相”的解构崇高，或者所谓“利益至上”的泛娱乐化，都是以主观替代客观、以片段取代整体、以臆想揣摩史实，不仅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危及国家发展的价值底盘、精神基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发展史、改革开放 40 年探索史，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体”，构筑出亿万人民的“意义世界”。鲁迅曾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的未来”，轻视历史、歪曲历史、消解历史，如何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梁启超认为，历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的确，历史不仅拥有“时空位置的特殊性”，也存在“时间的秩序”“因果的联系”。用孤立、片面、曲解的方法观察历史，就容易忽略客观的史实、必然的规律、主流的叙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说到底是将历史当作了予取予求的工具，是通过否定历史来否定现实、歪曲历史来歪曲未来。只有全面、客观、综合地认识历史，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才能让历史告诉未来、从历史走向未来。

历史从不遥远，也从未远去。常葆一颗敬畏之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我们就能在了解昨天的基础上，把握今天、开创明天。

《人民日报》（2019 年 01 月 31 日 04 版）

杭州 记忆

HANGZHOU YUEZHI
第一部分

责任编辑：郦晶

全省首条铁路 ——江墅线的史事

□ 祝一帆

如今，在拱宸桥附近，很难找到火车的痕迹，大运河的水缓缓流淌，河上船只穿梭往来，我们甚至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回荡着蒸汽火车的轰鸣声。



依据历史资料还原的浙江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江墅铁路（燕飞 摄）

江墅铁路是浙江省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浙江省爱国绅商集资、经营的交通大动脉。百年前，它从钱塘县江干闸口，逶迤北至仁和县拱宸桥新埠。全长16.14千米，全线有桥梁11座、涵洞17个，设闸口、南星桥、城站、艮山门、拱宸桥5个车站。工程项目与运输管理均由爱国绅商集资修筑并经营运作。

这条“巨龙”又是一条具有历史价值，大长中国人志气的铁路。从浙江铁路的历史来看，一般人都会立即想到沪杭甬线（后称沪杭线）和杭江线（后称浙赣线）。其实，最早还有这条江墅铁路，虽然，它早已化为青史一笔，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它是浙江爱国绅商“以拒绝外人，筹款自办为主”建造铁路的“试验田”。这条铁路的先驱者们背负起历史的巨轮，让蒸汽机车在杭州府（后为杭县）的大地上呼啸而过，从而开启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大幕。

江墅铁路建造的原因

自近代以来，湖墅和江干为杭州最为重要的两大码头，来自五湖四海的货物均在此两地集散。只可惜在大多数时间，都受制于往来交通之弊。据《浙江潮》1903年第5期载《杭州外省输入货物大宗数目表》一文中称：“江干和湖墅之间，城河通之，相距不过二十里。然河道狭

隘，货物搬运必越二日或三日，甚至五六日乃达。天旱之顷，城河水少，船舶雍滞，衔尾相接，即以米论，都雇人肩运，需时费工，莫此为甚。”清末同治年间（1862—1875），江墅铁路的修造动机最先是由在杭州湖墅拱宸桥租界里的日本人提出来的，要沟通京杭运河湖墅与钱塘江江干两地商贸交通。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日本驻杭领事大河平隆在致日本一位资深外交官的信中曾说：“自到达杭州以来，即随时注意设法促成此事，遇有中国官绅会晤机会，即劝说修筑该路（江墅铁路）乃至改善租界与省城之间的道路，是促进本埠贸易增长的捷径，应该从速兴办。”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日商于次年5月提出拟造江墅铁路的要求，遭到省铁路督办的严正拒绝。随后，日方竟一意孤行与华商单方面订立了不合法的江墅铁路建造合同草约。

就在此时，英国使节正式向清政府请准由英商承造5条铁路之权，其中一条就是介于江浙两省的苏杭甬铁路线。迫于帝国主义的壓力，中英订立了《苏杭甬铁路草约》。这一外国人掠夺路权的计划，因遭到江浙两省广大爱国绅士和民众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在此浪潮反击下，日商与华商单独建造江墅铁路的合

同草约，成了一纸废文。

最后，浙江巡抚聂缉槩在拒借外款、保护路权高潮中，向清政府请准由浙江绅商李厚佑、沈文孙合资筹办江墅铁路。

江墅铁路建造的经过

湖墅铁路建造中对线路的选择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从湖墅拱宸桥至江干闸口有东西两线可行，一是西路绕西湖而走，越万松岭抵闸口；二是东路靠杭州城郭外而行。但西路沿线古墓较多，迁坟阻力很大，又有破坏风景名胜之忧虑，故最后决定采用东路方案，由湖墅的拱宸桥起，经艮山门、清泰门、南星桥而止于江干的闸口，由浙江铁路公司负责勘测和路线设计。“现经股东会议，拟自清泰产左右分支入城，另开便门出入于此。于上下城适中之处，度地设站，车行定有暑刻，照派官兵守门，随时启闭，可无他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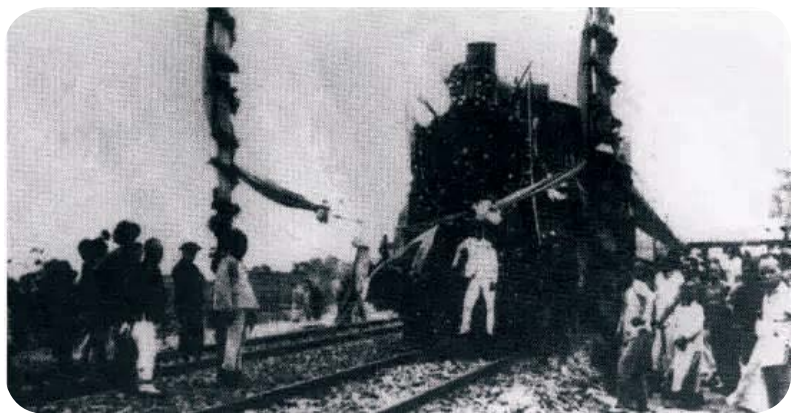


汤寿潜

为保证江墅铁路的顺利实施，浙江的爱国绅商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为抵制美英商人攫取浙江铁路修筑权的企图，以民间力量自造铁路，成立浙江铁路公司，一致推举原两淮盐运使汤寿潜为公司总经理，候补二品京堂刘锦藻为副经理。提出“工商各界、缩衣节食、勉尽公义”，动员绅商及普通百姓踊跃认购修筑铁路资金。当年，浙路公司开始进行线路勘测。

次年八月，这家公司又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分正科、传习科二班，正科招录约80人，三年毕业；传习科约40人，一年毕业，为浙江省首条铁路培养了第一批铁路车务与管理人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十四日，江墅铁路在起点站闸口（杭州风山门外罗木营），举行开工典礼。

该路全长16.14千米，其中设拱宸桥、艮山门、清泰门、南星桥及闸口5站，线路绕城垣外而行。各站相隔距离为：拱宸桥站至艮山门站5.81千米，至城站9.92千米，至南星桥站13.2千米。最先建造艮山门站至拱宸桥站一段。各站定员按业务量分配为：杭州站32人，拱宸桥站10人，南星桥站17人，闸口站18人，闸口货站12人。可见当时的闸口站与城站的规模几乎相等。因全



江墅铁路建成通车

线均系平原垦地，工程进展较快。至次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式通车营业（当时的清泰门站就设在清泰门外东北侧300余米处，1909年开始，清泰门站撤销移至城内，改名为杭州城站）。

江墅铁路建成之后

江墅铁路自钱塘江北岸的江干闸口起，循杭州城而过，经南星桥、清泰门（即现在的杭州火车站）、艮山门，北抵京杭大运河东岸的拱宸桥湖墅，是衔接钱塘江和京杭大运河的重要通道。清宣统元年（1909）起，沪杭铁路杭枫路段竣工全线贯通后，江墅铁路的艮山门至闸口段便成为沪杭铁路之干线，艮山门至拱宸桥段为支线。江墅铁路营运初期是客货混合列车，以后才逐渐分为客车、客货混合列车。列车开行由当年每天6对到次年十一月开行达7对。客车分头、二、三

等票价。当时，坐头等票从拱宸桥到闸口需4角5分。拱宸桥至艮山门、杭州、南星桥、闸口的票价分别为5分、1角、1角、5分。

江墅线的建成结束了杭州无铁路的历史，使杭州交通运输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它的建成不仅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之间的水陆交通，还为建造沪杭铁路积累了经验。该线为两大水系架起了一座陆上快车道，使南北众多物资顺利交流，并给杭城民众带来了出行的方便。“以前，大宗运输主要靠水运，北方的煤、天津鸭梨、山东大枣等货物走水路运到拱宸桥后，都得靠人力搬运到钱塘江，然后再运往南方各城市，有了江墅铁路就方便多了。”杭州运河指挥部副总工程师韩幼叔如此说。江墅铁路通车之后，继而又修建了艮山门至枫泾铁路。于当年七月竣工，八月，江苏、浙江两路在枫泾接轨。九月，全

江 墅 线 列 车 行 车 时 刻 表 （1927 年 4 月）

下行车由拱宸桥至闸口						站 名			上行车由闸口至拱宸桥					
72 号	70 号	68 号	66 号	64 号	62 号				61 号	63 号	65 号	67 号	69 号	71 号
22.35	18.20	14.40		10.20	7.55	到	闸口	开	8.15	10.35		15.10	18.35	22.55
22.28	18.13	14.33		10.13	7.48	到	南星	开	8.24	10.44		15.19	18.44	23.04
22.18	18.03	14.23		10.00	7.38	开	杭州	到	8.32	10.52		15.27	18.52	23.12
22.16	17.57	14.21	12.12	9.58	7.32	到		开	8.34	10.54	12.38	15.29	18.58	23.18
22.06	17.46	14.10	12.01	9.48	7.21	开	艮山	开	8.46	11.06	12.51	15.46	19.11	23.31
21.50	17.30	13.50	11.45	9.30	7.05	开	拱宸	到	9.00	11.20	13.05	16.00	19.25	23.45

此表资料来源：《民国快览》第 16 期（1927 年）内的《江墅支线行车时刻表》

线通车运营，改称为沪杭铁路。艮山门至拱宸桥一段，原江墅铁路的一部分，计长 5.81 千米便作为沪杭铁路的支线。

江墅铁路全线通车后，民国元年（1912）十二月十一日，孙中山来浙江曾从闸口乘经江墅铁路的火车到拱宸桥，他肯定了浙江的建路成就，称赞江墅铁路为中华民国商路之最。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前夕，拱宸站的年进出旅客近 60 万人次。不料，民国三十三年（1944），江墅线在抗日战争中被驻杭日军以阻止爱国军民的伏击扰乱为借口，将铁路线的北面艮山门至拱宸桥段的铁轨全部拆毁，只剩下站场与路基，从此江墅铁路不复存在。

如今，在拱宸桥附近，很难找到火车的痕迹，大运河的水缓缓流淌，河上船只穿梭往来，我们甚至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回荡

着蒸汽火车的轰鸣声。但是，你只要走进绍兴路，就可以找到江墅铁路遗址地。从 2008 年起，政府在现在的金华路和登云路交叉口，建成了一个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占地 0.67 公顷，有两段约 50 米的平行铁轨，铁轨上安

静地趴着重达 125 吨的火车头。在它们的边上，是依据历史资料还原的高 19.06 米的钟楼以及 140 平方米的候车室，建成后供人们参观。原来江墅铁路的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成为公路，改名为绍兴路，沿用至今。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燕飞 摄）

武林探微

HANGZHOU YUEZHI
第二部分

责任编辑：郦晶

别把徐村叫九溪

□ 袁长渭

现在，人们只知道有九溪，或者九溪十八涧，都把钱塘江边的徐村忘了，殊不知九溪和徐村是两回事。从杨梅岭村发源的叫九溪，青山翠绿，流水潺潺，途中汇合青湾、宏法、方家、佛石、百丈、唐家、小康、云栖、渚头九条支流，人们把她叫九溪。从龙井村流下来的溪水经过了众多的弯，人们把她叫十八涧。这就是本地人叫惯了的九溪十八涧。清代俞樾所写的“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把这里的景色描绘到了极致。九溪和十八涧在溪中溪汇合，一直流到钱塘江边的徐村，过徐村桥流入钱塘江，徐村桥头还有许多打鱼人在此卖钱塘江的江鲜。郁达夫还在九溪十八涧汇合处的溪中溪菜馆和账房先生对过课，茶馆老翁算账时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达夫对曰：“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妙趣横生。



九溪

九溪和十八涧是龙井和杨梅岭群山汇聚而成的溪流的名称，上游的村庄是龙井村和杨梅岭村，下游的就是徐村。现在，人们让九溪这个名称取代徐村，有点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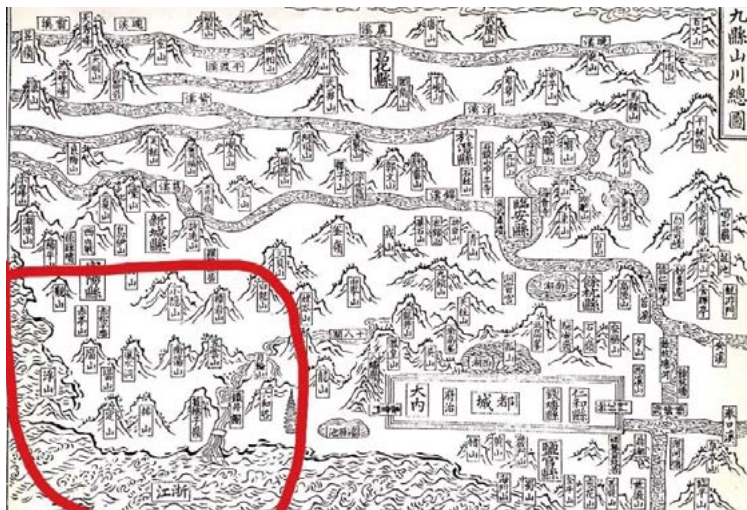
徐村位于九龙岭上，这里有江擦子岭，就在五云山脚下，“十龙九斫头，一龙不斫头，赶到长河头”。这个九龙岭就在秦亭山下，是当年秦始皇望江兴叹的地方。历史上的徐村是很有名气的，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钱塘江边徐村和范村都是钱塘县定山北乡最有名望的村庄，范村是范家集聚的地方，有名的就是范伯珪、范叔孙等。同理，徐村就是徐姓

人家居住的地方。据南朝宋史（这是刘宋，公元420—479，不是赵家的南宋）记载，“东晋濮阳太守徐熙，自东海南隐秦望山，以医名。子秋夫、孙道度世工其术。秋夫有为刍人医鬼事，宋文帝以道度疗疾为钱塘五绝之一。”徐熙、秋夫、道度祖孙三代皆为名医。

清胡惟善《定乡续咏》中有诗：“秦望山头鬼夜呼，吹灯魃魅觅秋夫。葫芦方药传三世，从此江村合姓徐。”传说中，有一个道士路经秦亭山下徐熙家门口讨口水喝，徐熙非常客气地招待他。道士喝了水后说：“君子孙当以道术救世，当得两千石。”

徐熙得到异人传授医疗秘籍和秘技，得一宝葫芦，葫芦中装着医书宝典《扁鹊经》，从此徐家成了名医世家。

徐熙的儿子徐秋夫更有离奇的故事传于后世。《南史张融传》记载，徐秋夫跟着父亲徐熙学医多年，医术高明，连鬼的病都能治疗。一天夜里，秋夫听到鬼的哭声，秋夫问其为什么哭。鬼说他生病了。秋夫说，我只能看人的病，不会看鬼的病。鬼说，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秋夫就做了“刍人”（草人），按照鬼的说法，灸四处，肩甲处针灸三处，鬼就不疼了。第二天，鬼化作人形表示感谢，



九县山川总图（南宋咸淳四年《临安志》附图）



宋朝西湖图（南宋咸淳四年《临安志》附图）

谢完就马上不见。故事虽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但是表达的是徐村徐家医术高明的意思。

徐熙的孙子徐道度医术也是十分了得，徐道度是个瘸子，走路不便，“宋文帝每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诊治，无不应验。徐道度官至兰陵太守”。南朝宋文帝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即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摹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

徐道度的儿子徐文伯也是以针灸见长，特别是对堕胎和催产等妇科有专门的研究，看了许多刘宋（南朝）朝廷里的疑难杂症，朝廷非常看重他。

徐村这里还有一个码头，是专门管理钱塘江上运送竹木的税务管理场，所以，这里也叫徐村“抽解竹木场”，和杭州钱塘门外的松木场一样道理。

徐村还是南宋首都临安府的十三个酒库之一，也就是酿酒厂和酒专卖店，所以，徐村还有一个热闹的集市，叫徐村市。每年的清明前酿酒，秋天时开新酒。开卖前，以白布三丈多，用竹竿拉起来做广告。上面写着“徐村库选到酒匠某人酿造上等醪辣无比高酒”，三五个人扶着老酒和广告前行。前面还有鼓乐、妓女、杂技做先导，围观的人不计其数。酒匠则戴着新帽穿着紫衣骑着马，跟在广告游行队伍的后面，以府中所赏彩帛、钱会、银碗驼负马前，谓之迎酒。酒以工匠而出名，这也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南宋诗人杨炎正有诗云：“钱塘妓女颜如玉，一一红妆新结束。问其结束何所谓？八月皇都酒新熟。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库中谁最强？临安大尹索酒尝，旧有故事须迎将。翠翘金凤乌云髻，

雕鞍玉勒三千年骑。金鞭争道万人看，香尘冉冉沙河市。琉璃杯深琥珀浓，新翻曲谱声摩空。使君一笑赐金帛，今年酒赛珍珠红。画楼突兀临官道，处处绣旗夸酒好。五陵年少事豪华，一斗十千谁复校。”这是增加税收的好办法，好像我们现在的招商引资，或者地块出让广告大会。原来古代就有这样的广告和招商办法。

这里的“酒新熟，浮蛆香”，如果您家酿过酒就知道，新酒飘香时，酒缸里酿酒的饭粒像蛆虫一样漂浮在上面。为了打到清澈的米酒，我们都用竹篮过滤。这里讲的酒不是蒸馏酒，都是直接的发酵酒，度数都不高，所以《水浒传》里好汉喝酒都是大碗喝酒，或者直接捧着酒瓮喝，换成是蒸馏酒，那是吃不消的。钱塘酒乡至今还用这个办法在酿米酒，我家也酿过多年，过年喝的都是这

种酒。哪怕现在过年，我还能喝到一些。如果您想看个明白，年底可以去外桐坞村看看古老的酿酒术。

包括徐村库在内的十三库的老酒还要进行赛酒大会，比个高低。高九万有诗云：“赛罢祠山赛二郎，酒行明日欲开张。愚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这里的“祠山”和“二郎”就是当年的名酒品牌，好像现在的茅台和五粮液。

当年的开新酒为什么会那么隆重，政府为什么会那么重视？这个与现在一样的，烟酒专卖，烟酒专营。这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的支出全靠酿酒业的收入。卖酒收入一分都不需要上交，相当于地税和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所有。皇粮收入都是要上交朝廷的，一分都不能截留。

酒靠粮食酿造，各个朝代政策不一，但都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粮食紧张时期，酒业就管得紧；粮食丰收，社会安定时，也就相对宽松一些。

南宋时，徐村作为京城近郊酒库，酿酒业特别发达。现在离徐村不远同属泗乡的双浦地区酿酒业也特别发达，这可能也是传统行业的继承和发扬吧。南宋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诗《过南荡一》中曾经写道：“秧才束发幼相依，麦已掀髯喜可知。笑杀槿篱能耐

事，东扶西倒野酴醾。”诗人到了定山北乡（南荡乡），看到了许多“野酴醾”。“野酴醾”是什么？是一种可以制作酿酒药的花。同在定山北乡的徐村酿酒业发达可想而知了。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酿酒师傅拿着神奇的酒药拌在糯米饭里，拌匀了捂在酒缸里。这也有可能就是用“野酴醾”制作的。

讲到这里，还是要说一下，早年的18路车在九溪的大樟树下有一个徐村车站，几棵千百年大樟树还屹立在那里。精通医术的徐姓人家不知道去了哪里。



传统酿酒方式



酒缸里漂浮的饭粒

据说，有一支去了东阳。徐村现有的徐姓人家都不是徐熙的后代了，徐村酒厂也早已不见。人们在这里看钱塘江最大的回头潮时，游九溪十八涧时，别忘了九溪车站这里原来叫徐村。

各位客官，可以去九溪十八涧走走，也可以在徐村找一个酒家喝喝“泗乡茅台”权当徐村酒，吃点钱塘江的江鲜，品品西湖龙井，聊聊徐村和九溪的往事，这样的日子好不惬意哦。

（作者系西湖区灵隐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里志 寻踪

HANGZHOU YUEZHI
第三部分

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 活跃阶段与发展分期

□ 陈凯
刘宇琪

浙江素称方志之乡，其地方志书编纂具有悠久的历史，始自宋代的乡镇志书编纂也有着优良的传统。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乡镇经济的发展和人文教化的繁盛，乡镇志书作为府县志的基础被大量编修，到了清代臻于极盛，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前列，备受瞩目与称道。

责任编辑：郦晶

根据查考统计，目前有确切名目依据的清代浙江乡镇志书 126 种，其中现存 71 种、亡佚 55 种。按照编纂时间来看，顺治志 5 种（包括清初志 1 种），康熙志 26 种，雍正志 3 种，乾隆志 31 种，嘉庆志 11 种，道光志 14 种，咸丰志 2 种，同治志 9 种，光绪志 20 种，宣统志 2 种，清末志 1 种，此外还有 2 种年代不详（详可参见陈凯著《清代乡镇志书研究》，复旦大学 2014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刘宇琪著《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研究》，上海大学 2019 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等相关研究成果）。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编纂数量最多的五个朝代依次为乾隆、康熙、光绪、道光 and 嘉庆。以下分别考察清代前期、中期、后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阶段，在此基础上探讨关于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的发展分期及其阶段特征等问题。

一、清代前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阶段与特点

清代浙江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总共编纂乡镇志书 34 种，约占总数的 27%，其中康熙朝编纂的乡镇志书有 26 种，占了清代前期货额的 3/4，是前期编纂活动的重心所在。就康熙朝编纂乡镇志书的具体情况来看，前期至中期（清康熙四十年以前）的

编纂活动最为活跃和密集，共编纂乡镇志书 20 种，占清代前期总数的约 60%，而后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雍正朝乡镇志书进行统计）则不到 10 种。就其编纂活跃程度的年际分布情况来看，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1673—1674）共编纂乡镇志书 7 种，这也是康熙朝前期编纂志书最为活跃的年份阶段。到了中期，则以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年（1684—1691）编纂志书最为活跃，占该期编纂总数的 70%。

至于雍正朝编纂的乡镇志书，主要集中在其统治后期（雍正六年至雍正十三年，1728—1735），以雍正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732—1735）编纂志书较为活跃。虽然从数量上看，雍正朝较之康熙时期编纂志书减少了近 90%，但从清代政治发展史来看，雍正朝在政策上延续了康熙朝的传统，因此我们一般可以将雍正朝志书编纂的情况视作康熙末年以来的延续。

二、清代中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阶段与特点

清代浙江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共编纂乡镇志书 56 种，占总数的 44%，地位举足轻重。其中乾隆朝编纂数量达到 31 种，成为清前期以来的第二个编纂最为活跃的朝代。若将乾嘉两朝合

起来看，则有 42 种，达到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编纂总数的 1/3，由此可以看出乾嘉文化在乡镇志书编纂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乾隆朝编纂乡镇志书的数量，占了清中期总数的一半多，成为清中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一个活跃阶段。就其具体情况来看，乾隆朝中期与后期（乾隆二十一年至六十年之间，1756—1795）所编纂的乡镇志书有 23 种，占了整个清代中期志书编纂份额的 3/4。而从年际分布所反映的志书编纂活跃阶段来看，乾隆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间（1757—1766），共有志书 7 种，占乾隆中期志书编纂总数的 2/3；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间（1785—1795），共有志书 10 种，占乾隆朝后期志书编纂的约 80%。以上这些年份或时段都是清代中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反映乾隆朝志书编纂最重要的时段指标，从清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份基本上能够与乾隆朝文治政策的繁荣发展遥相呼应。

至于嘉庆朝的情况，一般我们认为其在政治文化上属于乾隆朝晚期的延伸，乡镇志书的编纂活动主要集中在嘉庆朝中后期，即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四年间（1810—1819），共 9 种。道

光朝一半的乡镇志书（8种）皆是编纂于其统治中后期，即道光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1835—185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嘉盛世在文化上的惯性延续，以及从巅峰阶段逐渐开始走向低谷的趋势。

三、清代后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阶段与特点

清代后期浙江乡镇志书共有34种，在数量和比重上与清代前期的基本情况相同，然而在活跃阶段以及年际分布情况上，随着政治、文化大格局的变化，有着不同于以往时代的鲜明特点。其中咸丰、同治两朝合计11种，光绪朝共编纂乡镇志书20种，占清代后期总数的六成，宣统朝虽然有3种志书，但从其编纂实况来看，皆是光绪末年的延续，因此可以合并计算。清代后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高峰阶段是在光绪年间，与前述康熙、乾隆（乾嘉）时代成为三大高峰期。光绪朝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阶段主要集中于其统治中后期，即光绪十四年至三十三年之间（1888—1907），所编纂的志书占了该时段的55%。

到了晚清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活跃时期。其中，

同治朝乡镇志书数量约占晚清志书总数的1/4，且主要集中在同治朝后期（同治六年至十三年，1867—1874）。光绪中后期编纂的乡镇志书，一半多的比重都分布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三十三年间（1888—1907）。此外，宣统年间编纂的乡镇志书，以宣统三年最集中（1911），共3种。若将宣统朝视为光绪末年的延续，则可以认为光绪后期编纂乡镇志书占光宣两朝总数的一半。自清光绪后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宣统末年，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数量有所增长，这种变化的出现与晚清地理学发展的思潮，以及各地大力推行编修乡土志的实况是有密切关系的。

四、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发展分期及主要特征

基于对清代浙江各时期乡镇志书编纂活跃阶段的研究，将其发展史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并结合清代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政治史的演进特点，概述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

1. 清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653—1735）：乡镇志书编纂数量日趋增多

清初顺治后期至康熙中期，随着清王朝陆续统一全国与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因明末清初大

规模战乱流离而导致停滞的各项文化事业开始有序恢复起来。从顺治后期开始，清政府对方志编修事业日趋重视，修志活动得到复苏。随着清初江南地区的日渐恢复，各地乡镇的社会经济与人文交流开始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对于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而言，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顺治后期的乡镇志书编纂活动开始日趋增多。康熙朝前期延续了这种发展趋势，编纂志书的数量总体上和顺治朝保持平稳的接续，而且在部分时段中，其修志活跃程度大有提高，呈现局部迅速发展的态势。

从康熙朝后期（尤其是最后10年，1712—1722）开始，文治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地方编纂志书的活动也更趋兴盛，与此相应的是，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稳中有进，继续保持其前期、中期的增加幅度，这也体现了康熙朝文治政策的相对稳定性。由于雍正朝为时不长，但在文化政策上基本延续了康熙末年以来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体现经由康熙朝中后期及至雍正朝数十年间的一脉相承态势。而且，从康熙中后期开始直至雍正末年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浙江乡镇志书编纂活动日趋兴盛，数量递增，为乾嘉时期志书编纂鼎盛时期到来，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 乾嘉两朝至道光中叶（1736—1840）：乡镇志书编纂达到第一个高峰阶段

乾嘉时期浙江乡镇志书编纂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乾隆朝浙江乡镇志书编纂，尤其到了乾隆三十年以后直至末年这段时间（即中后期，1765—1795）更是达到了峰值，合计编纂志书约占该朝总数的一半。嘉庆朝前期数年基本上仍是乾隆末年政治、经济、文化在时代上的延续，其中后期（嘉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06—1820）所编志书占该朝总数的一半。

总体来看，嘉庆朝在志书数量上基本保持了乾隆中叶以来的发展幅度，具有很强的文化稳定性，这种比较稳定的发展趋势一直要保持到道光中叶。这足以证明其修志活跃程度在继承乾嘉时期以来优良传统基础上，展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自乾嘉以来及至道光中叶的近百年延续三代稳定发展的文化政策格局，已经达到了变化的临界点。

3. 道光二十一年至同治九年（1841—1870）：乡镇志书编纂的低谷阶段

道光朝后期历经了鸦片战争，“天朝的崩溃”对于国家的

影响不仅是在政治、军事上的败绩，对文化事业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到了道光末年，浙江乡镇志书的发展开始趋于停滞和低迷。许卫平先生曾指出，所谓低迷期当开始于清嘉庆中期（参见《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然而尽管嘉庆中叶开始内忧外患频繁，已经不再是最安稳的太平盛世，但由于文化政策的长时期稳定性效应，使之不至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立刻的回应与衰变。换句话说，这种低迷期的到来，也是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才能触动临界点的。

咸丰年间更是天灾人祸频繁，外国列强的入侵与国内民众起义交相发生，导致本朝政治环境颇为混乱繁杂。咸丰朝的浙江乡镇志书编纂水平跌入了清代的最低谷。这表明从道光末年始至咸丰年间，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活动已经进入了暂时的低潮阶段，这一持续要到同治初年所谓“中兴”格局出现、国内政治环境有所稳定改善为止。

4. 同治十年至宣统三年（1871—1911）：乡镇志书编纂的第二个高峰阶段

在此期间，伴随着新的历史演进趋势与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善，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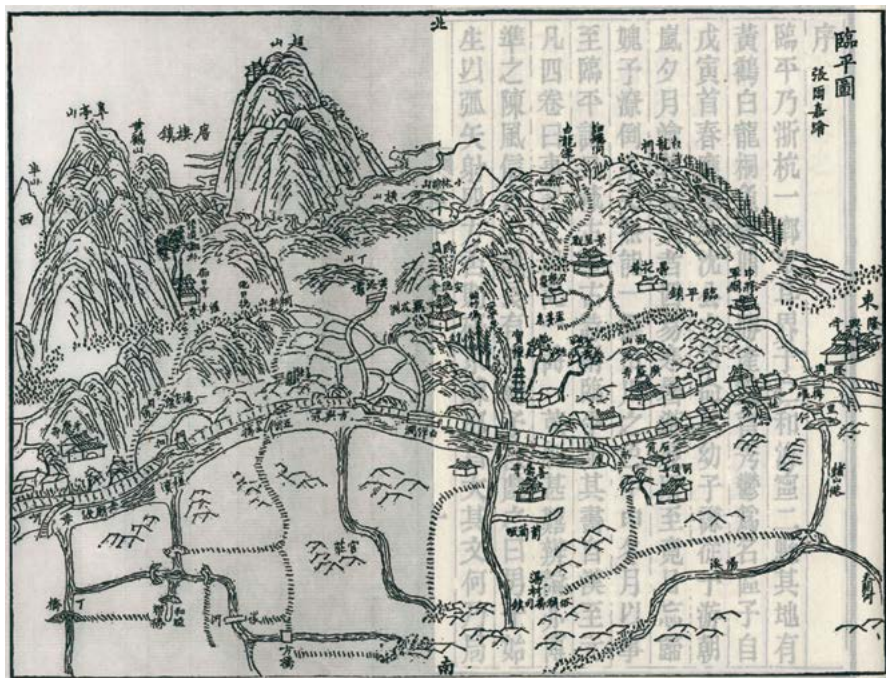
出了前一个低谷，开始达到晚清时期乡镇志书编纂的又一高峰。其中约有一半数量的浙江乡镇志书编纂于清光绪中期（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及至宣统末年的近1/4世纪当中。同治朝浙江乡镇志书编纂的近一半数量集中于最后三年时间（1872—1875）。光绪前期延续了自同治朝后期以来的浙江乡镇志书发展趋势，其中，光绪七年至光绪十年（1881—1884）所编纂的志书占光绪前期志书数量的一半。

从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慢慢迎来了浙江乡镇志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阶段。从光绪中后期以来，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就其编纂的活跃程度而言，其分布的年份以及时期的数量，在整个清代乡镇志书编纂史上也是罕见的，足以证明其修志事业的活跃程度。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各地大力编修乡土志、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的理念也是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为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本文系浙江省2018年度哲社规划课题（18NDJC244YB）“浙江乡镇志考录提要与整理研究”阶段成果]

余杭古代市镇发展变迁述论

□高建华



临平图（188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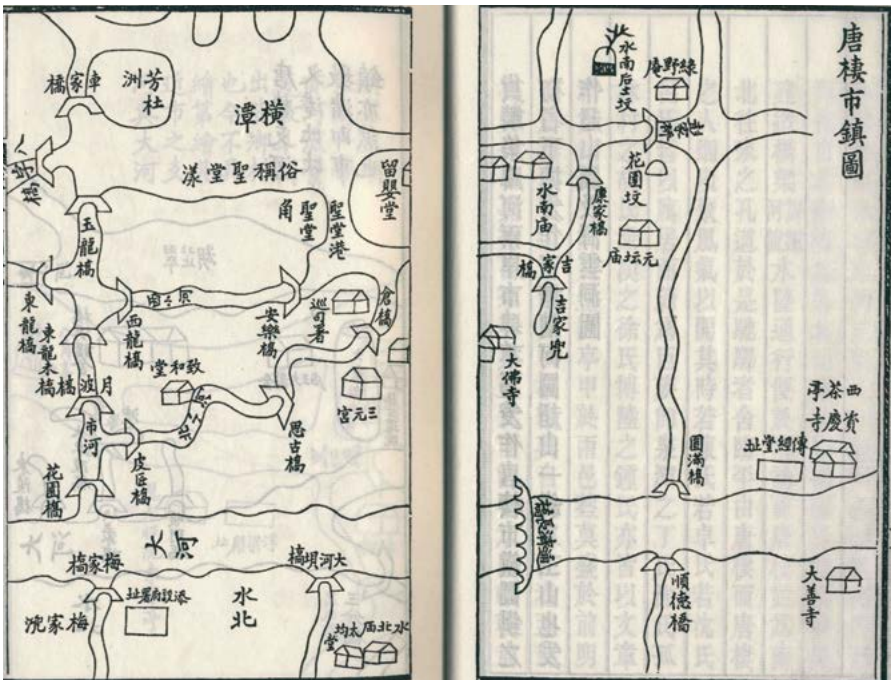
大运河、上塘河、余杭塘河作为余杭的三大主要水系，促成了余杭、临平、塘栖三个不同时期的商业中心的形成。

余杭、临平、塘栖等市镇，自古以来是百工云集的商业集镇。

北宋时，仁和县有四镇，余杭县有浣坎镇。北宋端拱元年（988）置临平镇。南宋定都临安，余杭为京畿之地，临平、汤村、范浦、江涨桥等为“仁和四镇”，南场、北关、安溪、西溪为“钱塘四镇”，后又有石澜诸市，各业兴旺，市场繁荣。

到了明代，大运河已成为余杭最重要的运输通道。塘栖镇开始繁荣起来。

20 世纪以来，铁路、公路等陆路交通有了较大的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办苏杭铁路杭州至长安段建成，在临平设站，临平镇又成了陆上交通之枢纽，客商往来频繁。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上的重要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杭将县治所在地设在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使得临平在经历了四五百年历史之后，取代塘栖镇再次成为余杭的经济中心。



唐栖市镇图（1890 年）

一、市镇兴起：从“钱仁八镇”到“杭县七镇”

11 世纪中期，杭州城郊有 8 个设官市镇——钱塘县有南场、北关、安溪、西溪 4 个镇，仁和县有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 4 个镇（《元丰九域志》卷五）。经历了 900 多年的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杭县有临平、塘栖、乔司、瓶窑、三墩、留下、笕桥 7 个建制镇（民国《杭县志稿》）。

从北宋时期“钱仁八镇”到民国时期“杭县七镇”，杭郡境内的市镇数量、分布密度均没有大的变化。各市镇之间距离最远不足百里，自然条件、人口资源等都极为相似，但它们发展道路却不一样。

南场、北关、范浦、江涨桥、西溪（留下）5 个镇，发展速度不一，由于紧附省城，有的逐渐消亡，有的逐渐融入城市，成为杭州的一部分。三墩、笕桥两镇，在明清时期才聚集成市，但发展缓慢；安溪镇，地处苕溪水路要冲，一直仍是小型集镇。

临平处于宋、元时期运河主干道，发展相对较为顺畅。特别是南宋时期，繁荣达到顶峰。但 15 世纪运河漕运改道后，发展滞后，其运河市镇的重要地位迅速被塘栖取代。

塘栖镇“宋时所无”“运道改移”，遂致“日益繁盛”。聚市不久，仁和县就将县丞（为县令之佐官）设驻塘栖，明确了其作为仁和县首镇的地位。清代为“市镇之甲”（乾隆《杭州府志》），民国时发展为杭州地区的第一大市镇。

明代中期，余杭县境内还增加了新街市、瓶窑镇、黄湖镇和长乐镇等市镇，“四时茶、纸、盐、米诸货毕集”（嘉庆《余杭县志》）。自缫土丝成为余杭农家主要经济收入，余杭、临平成为当时茧丝购销的重要市场。嘉靖年间，倭寇屡犯塘栖、临平、余杭诸镇，总督胡宗宪总制东南四省，扫荡倭寇。数年的战乱，使余杭商贸经济一度遭受重大损

各个时期余杭市镇情况表

县名	宋元丰年间 (1078—1085)	明万历年间 (1573—1620)	清乾隆年间 (1736—1795)	民国年间 (1912—1949)
钱塘县	南场、北关、安溪、西溪	瓶窑	瓶窑、常乐	临平、塘栖、乔司、瓶窑、三墩、留下、笕桥
仁和县	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	北新桥、临平、塘栖、范浦、汤村	德胜桥、江涨桥、临平、塘栖、汤镇	
余杭县		新街	闲林、双溪、石漈	在城、闲林、双溪、石漈、仓前、黄湖



临平镇（摄于1985年）



临平镇（摄于1996年）

失。至万历年间，塘栖镇商贸之繁荣已相当于一个县城。

二、市镇发展：从“专业市镇”到“综合型市镇”

“杭县七镇”出现较早的市镇为靠近杭州城的南场、北关、范浦、江涨桥、西溪诸镇，商业

类型相对综合，主要是起到补充省会杭州的作用；而距离杭州城稍远一点的临平、乔司、瓶窑诸镇基本往专业市镇发展。

瓶窑，宋代设巡检司（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其功能以军事为主），明代设瓶窑镇。清初杭州协副将王鼎新部驻瓶窑，

清末杭州府捕盗同知驻瓶窑镇。北宋瓶窑已成为制陶的专业村，后来发展为山货竹木业的市镇。

笕桥，古称茧桥，物产以蚕茧、棉、药材、麻布为盛，各地商贾多在此聚居。

汤村镇（乔司），地处盐场，土地易植络麻，一直是织麻为袋、

服务晒盐业的小型麻业集市；近代，晒盐业退化后，成为药材专业市镇。

清代中期，闲林与双溪、石澜并为“余杭县三镇”。明清时期，余杭县手工造纸盛行，纸行众多，更是茶叶的重要集散地。

而塘栖出现较晚，却在短时间发展成为大型的综合性市镇。

三、市镇转型：从“农业经济”到“商业经济”

普通市镇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乡脚”（小商圈）内居民的商品交换——“小商业”，如南货、酒酱、棉布、百货等生活物资，只适合15千米~25千米的范围内流通。专业市镇支柱产业的产品才具有相对较大的辐射面，如临平镇的丝、麻，笕桥镇的药材，瓶窑的陶瓷、竹木，都是相对容易保存和运输的。

但是，临平所在的上塘河水位不稳定，瓶窑、安溪所在的苕溪水量取决于上游山洪，笕桥、留下、乔司诸镇所在的河道都不适合大规模水上运输的“大商业”，唯独“河宽二十丈”、处于大运河主航道上的塘栖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

塘栖镇在15世纪市镇形成之初，就出现依托运河的“大商业”——粮食与丝绸的交易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本地消费，而是中转后外销以增值。商人们在春季经营茧丝，在夏季经营

瓜果，在秋季经营大米，在冬季经营鱼虾，使货币资金在一年之内得到多次周转，提高了资本的利用率，推动了塘栖市镇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水产、粮食、水果等各行业繁盛并都以运河为通道，销往杭州、嘉兴、湖州、上海、江苏等处。依托大运河，塘栖完成了从“小商业”到“大商业”的转换。

四、市镇繁荣：从“手工业”到“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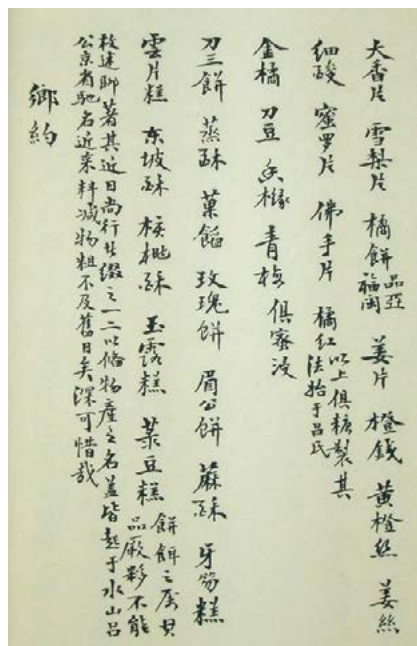
旧时杭郡附近的农村，乡民自古织土布。清代，已形成北新关、乔司、塘栖三大土布集市。周边如大麻杜布（“杜”，吴越方言，泛指手工制作、土制之意）也流入博陆、临平诸市镇交易。雍正年间（1723—1735），临平拥有轻绸机数量不下二三百张（《北新关志》）。但大关、乔

司、临平在近代都没有出现纺织业的机械化。只有在运河市镇塘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塘栖劳祖华在运河边的水北街开办波华织绸厂。稍后，塘栖经厂、义大布厂也相继在运河边建成开工。此后，原本从事纯贸易的塘栖商人也开始兴办实业，如劳氏在杭州投资兴办“四宣布厂”、卓氏在杭州投资兴办“南浦布厂”。

早在明代前期，“海宁与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而临平所处的上塘河因水道狭窄、水位不稳定等因素，交通条件相对落后，不能赢得杭、湖大贾的青睐前来投资兴办实业，临平终究与近代工业化失之交臂。到20世纪初，在临平镇的周围，塘栖镇有四大机械缫丝厂和几家小型丝厂，海宁长安镇有长安丝厂，大麻镇有苕溪丝厂，而临平



临平火车站西道老照片



清初地方志《栖里景物略》中
有关塘栖蜜饯的记载

却只能发展茧行业，沦为缫丝业的配套市镇。

至明代弘治年间，依托大运河的便利，塘栖完成了从“筑塘而栖”到“水关划然”的华丽转身。晚清以来，义大布厂、波华织绸厂、大纶丝厂、崇裕丝厂、祥纶丝厂、北德泰、乾泰新油厂、范鼎盛、广泰丰米厂、姚永兴酿造厂都沿大运河而建，运河北岸成了塘栖镇的工业带，而运河南岸成了商业带。

运河的改道，带来大量人口的迁移，大大影响、改变运河沿岸的社会风气和居民的消费习惯。运河的改道也带来大量外来投资——从15世纪中叶徽商迁徙塘栖“开典、肆米、贸丝、开车”，到19世纪末杭州、湖州富商到塘栖投资开办机械化缫丝厂。在1929年首

届“西湖博览会”上，塘栖“汇昌栈”（百年汇昌）的桂花姜等蜜饯系列产品，与张小泉剪刀、胡庆余堂中药、都锦生丝绸一起获得西湖博览会的最高奖——特等奖。借托运河，塘栖完成了从“农产品输出”到“产成品输出”的嬗变。近代，蜜饯业一直是塘栖传统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从11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杭州城郊诸市镇长达900年的发展过程中，运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世纪，运河漕运的改道直接改变了临平、塘栖二镇的发展轨迹。塘栖因得大运河主航道之便利，取得了关键性优势，长期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使得塘栖发展起“大商业”，经济日趋多元化。依托运河的“大商业”起先主要服务于当地手工



塘栖镇广济桥



余杭镇通济桥老照片

业和农副产品的输出，而“大商业”的日渐繁盛，又促使了近代工业的诞生和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塘栖在杭郡诸市镇中率先进入了“工业化”，且逐渐形成了配套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依靠大运河，塘栖终于发展为区域性综合大市镇。

五、市镇组织：从“自然发育”到“机构管控”

市和镇原是不同的概念。市指交易场所，起源很早，《周易·系辞》有“日中为市”，后成为城的附属设施，筑城必辟市。农村交易场所也称市，如集市、草市。镇则是军队驻防地点，始见于唐。因驻军处常有商贩聚集，至宋代，“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宋

史·职官志》）。至明代，正德《姑苏志》已称“商贾所集谓之镇”，弘治《吴江县志》也称“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市与镇已无区别。在行政上，市镇都是县以下的一级建置，直至清代，镇一般还大于市。又有称关、店、集者，实际相当于市镇。杭州府的唐栖镇，宋时无名，明初开运河，后又修塘岸转漕，顿成南北孔道，清康熙时称市，乾隆时称镇。这些市镇乃是彼时江南社会、经济、宗教、教育等活动的节点，是经济繁荣与社会秩序的枢纽。据民国《杭县志稿》记载，明代中期开始，余杭境内的安溪、临平、塘栖、乔司各市镇的“政府机关”相继设置。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权力控制经济，这个市镇网络被严

重侵蚀。地区、县、乡所在城镇被赋予了特权地位，不少“市”被改造成“城”，丧失活力；大量的“城”也冒充“市”。即便如此，后来的社队工业和乡镇工业也仍然是以市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仅成为人口的“蓄水池”，而且是商品的集散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以此为基础发育而成的“市镇”，也仅有此类市镇，有可能成为市民的自治实体。历史上市镇的自治确实是相当发达的，这是由市镇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市”民的价值理念终究是不同于城民和乡民的。以自然发育之“市镇”为基础，不仅是城市化的正途，也有助于以自治原则重塑中国的治理体系。

六、古代市镇对当代新型城镇建设的启示

余杭这些古镇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积淀在《余杭历史文化名镇》一书中有深入而生动的展现。古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之间的中心，与仅以农业为主业的乡村所不同的是，古镇的生活有很多传统的服务业和手工业，也会有传统的诗礼传家的生活，表现出古镇和农业生活相联系，但又有所区隔的生活。古镇往往是传统的乡村和世界的连接点，也是让城市和乡村扣连的地方。镇子有商业活动和更多的社会交流，也有许多手工业和文化的集聚，表现出比乡村丰富和灵动的特质，而同时，传统的生活仍然是古镇生活的核心，它常常让传统的生活方式展现出独到的魅力。

以笔者的观察，余杭古代市镇的发展与变迁对当代新型小城镇建设有不少启示或值得借鉴的

地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有良好的交通条件，长期吸引外来投资者。余杭古镇大多因河而兴。余杭的市镇一般都经历了由集市到镇（小商业都市）的发展过程。即使同一市镇，其规模和经济作用前后也大不一样，多数市镇规模日趋扩大，市场繁荣。往往是生产越发展，商人越活跃，商业越兴盛，市镇发展越迅速，规模越宏大。在当代，招商引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强大引擎。余杭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吸引各类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来加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问题。

2. 要发展多种支柱产业，形成大商业、大流通。明清时代，余杭诸市镇出现了商品贸易的繁

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工农业全面走向现代化。余杭区已提前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急速转变之中，我们应当以智慧经济引领城镇化建设。当前，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是余杭区的战略抉择。

3. 乡贤文化的传承。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互相促进的。古代名镇都不只是一个经济名词，更是一个文化名词。古代一个县城（一个古镇也大致如此）必备的建筑有三个：县衙、县学、城隍庙。如，塘栖镇历代名人荟萃，人才辈出。据光绪《唐栖志》的不完全统计，自宋代至清末，先后出会元1名、解元2名、翰林院庶吉士10多名、进士38名、举人104名、贡生57名，太学生不计其数。塘栖古镇办学之风



塘栖运河两岸



今日塘栖

颇盛。这些人有机会取得政治地位，他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强大的社会联系，促进自由通商。在当代，特色小镇建设，除了需要有经济支撑和差异性概念，更需要有一批真正理解、懂得本地历史传统与民众情感的“文化人”“乡贤”立足本地，扎根生活，联结社区，自觉承担起本地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建设和品牌营造的重要责任。

4. 市镇布局合理，空间规划科学。与省城的距离适中，既获得它的经济辐射，又避免直接融入大城市。当然，近代以来，余杭诸多市镇因处杭州近郊，直接融入了大都市，这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近年来出

现的特色小镇应当定位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既有助于乡村振兴，同时也可以缓解城市的压力。

5. 因地制宜找优势，突出特色寻发展。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发展优势，怎么把特色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把竞争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要多调查、多研究。比如，有些地方创新条件很好，人才聚集，高新特色鲜明，就要加快推动创新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大环境建设，打造一流创新小镇。有些地方工业不是很发达，但生态好，就要在绿色生态上做足文章、打造特色小镇。又比如，家政服务业是需求很大的市场，人力资源比较

丰富的一些地方，就可以发展职业教育。

坚持产城人融合，重视发挥政府引导和指导作用。按照“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要求，科学规划自身在城市群中的功能定位、产业和人口布局。培育新生小城镇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产业支撑，要注重产业兴市，产城人融合。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以人口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为出发点和归宿，强化空间规划“集权”。以优势产业集聚人口，以优良生态吸引人口，坚持创新促发展。

（作者单位为杭州市余杭区档案局）

方志 动态

HANGZHOU YUEZHI
第四部分

责任编辑：王惟惟

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 ——第二届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第九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圆满闭幕

□ 摘编自中国方志网

7月17日，作为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第二届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圆满闭幕。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高京斋出席闭幕式并做大会总结，国际图联方志及族谱部门主席、台湾世新大学信息传播学系林志凤女士作为专家代表发言。出席闭幕式的还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巴兆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邓建平，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习加。闭幕式由邓建平主持。

高京斋对此次会议的总体情况做了回顾、总结，概括了会议的特点，并对地方志事业未来的发展做了展望。他指出，此次会议是继2017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的又一次盛会。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方志文化的传播，加强海内外学者在研究利用方志资源等方面的交流，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他强调，希望大家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坚定方志文化自信，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地方志编纂的历史经验和实际问题出发，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

上级动态



7月17日，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第二届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圆满闭幕

基础；坚守方志理论研究阵地，不断加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合作。

林志凤在发言中，对会议做了认真总结和中肯的评价，还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建议。她建议，中国的地方志机构和人员应当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参加国际会议，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应当吸收世界各地的地方志研究者参加中国地方志学会，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要建立专家库，加对方志同仁的专业培训；做好地方志数字化、标准化建设，以利于海内外学者利用；推动城乡间地方志协调发

展。她表示将会把此次会议的交流情况向全世界的图联工作者分享，推介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方志文化。

此次共有14人做了大会发言，96人在分组交流中发言并点评。闭幕式上，召集人代表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张军，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莫艳梅，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赵海良，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严忠良分别介绍了各组的学术交流情况。在分组讨论中，各组还专门安排时间对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用地方志等地情资料进行了主题讨论。

第六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系列会议等“三会”在吉林市举行

□ 摘编自中国方志网

7月23日，第六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系列会议、中国年鉴精品工程2019年卷申报年鉴篇目研讨会、第四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开幕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会议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分会主办，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承办，吉林市地方志办公室协办。会议系中指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四。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秘书长、中指办主任冀祥德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云鹤，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盖东平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孟亚男出席开幕式。中指办年鉴处处长刘永强主持开幕式。

冀祥德在讲话中提了四点要求：一是要坚持政治导向，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如期实现“两全目标”、全面推进地方志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与解决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紧迫问题结合起来；二是要坚持目标导向，紧紧围绕“年鉴全覆盖”攻坚，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三是要坚持质量导向，紧紧围绕提高年鉴质量目标，把高标准树立起来，把严要求落实下去，使“年鉴全覆盖”不仅有量的提升，更有质的突破，为年鉴大国向年鉴强国迈进提供坚强保证；四是要坚持人才导向，着力解决地方志人才



7月23日，第六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系列会议等“三会”在吉林市举行

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等瓶颈问题，不断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持续加强人才培养，提升队伍整体水平。

李云鹤在致辞中简要介绍吉林省情和全省年鉴工作的特色及亮点。他指出，在中指组及其办公室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吉林省在推动修志编鉴、发挥地方志资政育人作用和人才培养方面等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希望能借召开这次会议的机会不断提高自身年鉴编纂业务水平，努力打造更多的精品佳作。

盖东平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吉林市的发展情况以及吉林市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她提出，希望在中指办的指引下，吉林市地方志事业能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

中指办、方志出版社有关专家，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分会相关工作部负责人、特邀专家，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推荐的年鉴专家，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各试点单位、各申报单位以及全国各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或专业年鉴主编（副主编）、年鉴编辑部主任（副主任）、年鉴社社长（副社长）230余人出席开幕式。

市级动态

市政府办公厅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专题学习讲座

□吴铮



7月17日，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冯跃民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学习与历史思维的培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我们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的重要作用、要求领导干部提高历史思维能力，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7月17日，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办公厅党组成员、市志办主任蒋文欢围绕“讲好杭州故事，强化使命担当”做专题学

习讲座，讲座由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江奔腾主持。

讲座以“鉴往知今、以启未来”为题，从史前、夏至隋、唐、宋、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追溯了杭州的文明发展史，梳理了杭州从“钱塘小县”到“东南第一州”再到“浙江省会”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了对杭州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及其主要政绩，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平实朴素的语言展示了各个时期人物的智慧和才情，以及善政爱民的事迹。

讲座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多读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要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前不负古人、后不负来者的历史责任和担当，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在杭州走向世界名城的历史进程中，开拓前行，为杭州未来的发展奏响光辉的华彩乐章。

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研究室、市数据资源局近170名党员干部参加了讲座。

市级动态

■ “浙”里相约，“志”里看杭

□马琦敏

7月6日上午，主题为“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开幕。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开幕会上致辞并出席主论坛。

为加深台湾青年大学生对祖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进一步培养浙江省赴台学习的大学生家乡的感情，7月7日上午，省教育厅组织部分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的青年学生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参观中，两岸青年学生了解了杭州从古至今在建置、自然、政治、人物、文化、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地方志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直观的认识。

参观结束后，大家来到资政堂，方志馆馆长冯跃民对全体学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它与正史、家谱组成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雕版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伟大发明。杭州市方志馆把雕版印刷和地方志相结合，推出了《西湖十景》线装书制作体验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活动，让两岸青年进一步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共同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

雕版印刷涵盖研磨、刷墨、覆纸、刷印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学生们有一次就成功的，也有经过数次

尝试才成功的。随后，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体验线装书制作。折页、排序、对孔、穿针、钉线、贴签条，每一步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当一本本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完成后，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不少同学说，这次雕版印刷和线装书体验活动，不仅考验手工技巧和耐心，也充满了浓浓的穿越感，深感古人读书求知之不易，今后会更多地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月7日上午，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的青年学生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并体验古籍线装书的制作（黎似玖 摄）

区县动态

■ 上城区加强区志编辑部分纂业务培训

□上城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 黎颖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杭州市“两全目标”推进会议精神，7月1日和8日，上城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先后两次召开区志编辑部培训会议，区志编辑部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针对当前分纂面临的实际问题，会议从政治、保密、体例、资料、行文、规范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导，提出解决办法，指出注意事项。为更加直观

地让责任编辑掌握修改要领，会议还以《卫生篇》为样稿，指出存在的问题，讲解如何修改和解决相关问题，为各部类分纂提供参考和范式。最后，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倒排时间，以周为单位抓推进，坚持进度、质量两手抓两手硬，保证按期完成编纂任务。

■ 上城区召开《南宋临安皇城篇》专家评审会

□上城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 黎颖

为体现志书地方特色，也为南宋皇城遗址申遗和保护利用贡献方志力量，7月25日，上城区组织召开《南宋临安皇城篇》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省市有关专家何忠礼、龚延明、董郁奎、颜越虎、张美虎、高丹为评审会成员。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歆，区政协副主席陈少华出席会议，区委宣传部、区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和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3家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常务副主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主任李晋楠主持。

《南宋临安皇城篇》是《上城区志》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篇章。上城区委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吉军、杭州博物馆馆长杜正贤、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凤凰山管理处文博副研究员洪俊组



7月25日，上城区召开《南宋临安皇城篇》专家评审会（刘毅 摄）

成的专家团队负责该篇的撰写工作。经过评审，评审专家组认为《南宋临安皇城篇》资料较为翔实，事实清楚、观点正确，基本符合志体要求，可读性比较强，做到了图文并茂。同时专家们就如何编写和编排更为科学合理，以及规范问题、敏感问题、述而不论和形容词使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撰写团队将根据专家所提意见和建议，围绕几个重点问题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 滨江区召开年鉴撰稿人员业务培训会

□ 滨江区志办

7月24日，滨江区志办在区文化中心召开全区年鉴撰稿人员业务培训会，区志办副主任张烨主持，《杭州年鉴》执行主编蔡建明授课。《滨江年鉴》编辑部全体成员及60多家单位的撰稿人共约80人参加培训。

蔡建明围绕“地方综合年鉴写作编辑”主题，从中国年鉴出版概览、地方综合年鉴地位、年鉴框架、年鉴条目、年鉴编辑规范五个方面，结合《滨江年鉴（2017）》实例进行解析。张烨通报了《滨江年鉴（2019）》编纂工作进展，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会上，区志办向撰稿人发放《〈滨江年鉴〉编纂工作手册》，手册汇集了条目例析、编纂规范细则，便于撰稿人员参考使用。撰稿人还现场体验“滨江年鉴”微信小程序在年鉴数字化方面的应用。

2019年是杭州市志办确定的年鉴“质量提升年”，《滨江年鉴》编辑部通过培训会、审稿会加强与各承编单位联系，积极参与省、市各级培训，提高撰稿人员写作、编辑水平，为全面提升《滨江年鉴》编纂质量夯实基础。

■ 萧山一志一馆记录凤凰故事

□ 萧山区委史志编研室

村志和村史馆是一个村落的精髓所在。7月24日，杭州市萧山区凤凰村迎来了值得纪念的两件大事——《凤凰村志》发行和凤凰村史馆开馆，凤凰的历史文化由此写进了书里，“搬”进了馆中。

《凤凰村志》是一部关于凤凰村的“百科全书”。全志分上下册，全彩印刷，总计231万字，插图1700余幅，表格778张。上册包括村庄、姓氏、人物、村民访谈、凤凰村民未来期待调查等篇章，下册包括衙前农民运动、村政、村区建设、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村级经济收益分配、村民生活、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艺文、风俗等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凤凰村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该志由萧山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莫艳梅主编、总纂，采取“群众口述、专家记录、全民参与”的方式，其中“村民访谈”编共20多万字，创大规



《凤凰村志》授书活动（沈雷 摄）

模口述史记入村志之最；“姓氏”编，以一户一个基本情况表，配一户一幅全家照，一户手写一句最想说的话，反映民情民意民愿；“凤凰村民未来期待调查”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这在全国村志中也是首例。

《凤凰村志》上还印有二维码，成为全国首部与纸质书同步发行的“掌上村志”，为凤凰故事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

凤凰村史馆共2层，建筑面积435平方米，布展面积395平方米，分为“前言”“中国红色农同运动的开创者”“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践行者”“乡

区县动态

村振兴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中国梦美丽乡村的探索者”“结束语”六大篇章，采用图文、影像、实物和场景模拟等表现形式，展现凤凰村“腾飞的足迹”。

《凤凰村志》发行暨凤凰村史馆开馆仪式，由衙前镇镇长主持，衙前镇党委书记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李文，

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潘捷军，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蒋文欢，萧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顾春晓，萧山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主任沈迪云，衙前镇各村和社区书记，驻衙前机构负责人，镇村干部代表，凤凰村民代表近 200 人共同见证。

《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想什么——凤凰村农民访谈录》出版

□萧山区委史志编研室

近日，《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想什么——凤凰村农民访谈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计 31.6 万字，插图 160 余幅。

该书由萧山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莫艳梅著，通过对杭州市萧山区凤凰村 36 位农民的访谈（包括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民小组长、私营企业主、民兵连长、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农村妇女、老人、外来农民工等），生动讲述了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展现了当代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奋斗历程，回答了“富



裕起来的当代农民在想什么”的问题，亦可供资政参考。

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文在书序中称：“通过攫取凤凰村历史，让我们从小见大，从一个村庄看到中国的农村，从一个个农民看到农民的中国，从一个个‘小人物’看到当代的中国社会。莫艳梅的这本著作不失为一部成功的开拓性著作，不仅具有较高的资政价值，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对现在研究有用，对将来研究更有用，尤其对研究当代社会史有用，可谓功莫大焉。”

《余杭乡镇企业志》出版

□余杭区史志办 李景苏

由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业务指导，余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编纂的《余杭乡镇企业志》日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7 月 12 日，志书首发式举行，余杭区相关领导、余杭区部分老领导、余杭区史志办主任和余杭区信息化局主要负责人等出席。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蓬勃发展，成为余杭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是余杭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为记录这段历史，更为今后余杭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余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从 2016 年起，联合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力量，开展志书的编纂工作，经过近 3 年时间的努力，终纂成出版。该志在 1988



区县动态

年的《余杭县乡镇企业志稿（初稿）》和1990年的《余杭县乡镇企业志稿（征求意见稿）》（两稿主编：金富荣、王双士）的基础上，修改调整和补充资料，下限止于2001年。

全志设16篇，共30万余字。比较全面、客观地记载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余

杭人民在中共余杭县（市）委、余杭县（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艰苦创业、勇于拼搏，使余杭社队工业迅速崛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的历史；展现余杭农民致力改革，敢为人先，积极进取，进行伟大创造的历程。该志的出版，将为今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保护历史文化 传承历史文脉—— 二轮修志开展后余杭古籍（旧志）整理成果

□ 余杭区史志办 李景苏

余杭历史悠久，文脉深厚，素有修志的优良传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修有《钱唐记》，后尤从明代开始延续到清代，盛行修志。明至民国时期共修50余种县志、镇志、寺观志、道观志等。这些志书、古籍保存了余杭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人物、名胜、古迹等方面大量的宝贵资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及其他种种原因，不少古籍（旧志）已经散佚，有的已成孤本。为抢救和保护余杭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志旧籍的学术价值，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余杭区史志办自社会主义时期第二轮编修地方志展开后，从2009年起，有计划地开展古籍（旧志）的整理、点校和影印重版，抢救和保护了诸多有价值的地方志书和古籍，为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余杭的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也推动了余杭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2009年，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编纂《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的总体要求和安排部署，从当年6月起，聘请相关专家，开展旧志整理、点校，于次年末，将《余杭县志（明·万历）》等12部旧志整理成两函共200余万字的《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由西泠印社出版。

2011—2018年，余杭区史志办积极开展古籍（旧志）的影印出版工作，共影印出版了总字数1000余万字的36部古籍（旧志）。所有古籍（旧志）尺寸均为180mm×285mm，材质、颜色全部统一。影印线装，装帧精美，书品古朴，档次高雅，力求还原古籍（旧志）面貌。多数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影印出版古籍（旧志），以本真面目永存世间，丰富了地方历史文献库。这些资料，对于人们研究、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开发利用丰厚的史志资源，传承历史文脉；对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发挥了古籍（旧志）“资政、存史、教化”的独特作用，为各级各部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进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杭城新事

HANGZHOU YUEZHI
第五部分

供稿：秦文蔚 郦晶
责任编辑：吴铮

全省首条穿越地铁的综合管廊全线贯通

7月1日，杭州备塘路（艮山西路—德胜路）地下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全线贯通。这是浙江省首条成功穿越地铁的综合管廊，也是杭州首条兼具人防功能的综合管廊。其地址位于杭州市备塘路，南起艮山路管廊北侧，北至德胜路综合管廊，沿线下穿彭埠备塘河和白石港处。该综合管廊集电力、通讯、给水等线网管道于一体。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内市政配套水平。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在萧山举行

7月3—5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暨2019年世界科技物流大会在萧山举行。此届博览会以“科技改变物流”为主题，展示中国物流业科学引领、技术创新的丰硕成果，举办2019世界科技物流大会，包括开幕式、全体大会、智慧供应链峰会及智慧物流应用创新峰会，聚焦智慧物流技术升级传统物流服务，以及互联网新经济的供应链创新，搭建沟通、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



2019 年杭州国际音乐节举行

7月5—20日，2019年杭州国际音乐节举行。此次音乐节历时16天，包括21场驻节演出、12场公益普及演出、6场大师班、5场音乐讲堂以及城市灯光秀、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等46场（项）演出及活动，并邀请来自国内及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20个国家近700位顶级艺术家加盟。柏林爱乐卡拉扬学院乐团成为音乐节驻节乐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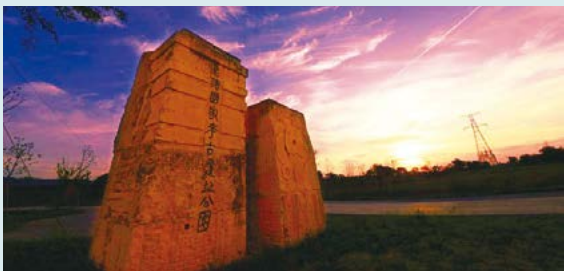
首届数字经济与电竞产业高峰论坛在萧山举行

7月6日，首届（中国·萧山）数字经济与电竞产业高峰论坛在萧山举行。100多位资深电竞创业领军人物和杭州数字体育创业代表，共同探讨数字经济与电竞产业的未来趋势，挖掘萧山新一轮数字经济的特色亮点。会上，位于新塘街道的萧山电竞双创中心与FIFA游戏开发工作室、BTRG电子竞技俱乐部、TYLOO电子竞技俱乐部3个公司成功签约。该中心还联合杭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署框架协议为残疾人群提供特殊就业帮扶。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当地时间7月6日10时42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根据世界遗产第3、4条标准，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庆祝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杭州推出主题庆祝活动，采用“一主三副、四地联动”模式，良渚博物院北广场设立主会场，西湖景区涌金小广场、运河钱运茶楼小广场、萧山钱江世纪城公园小广场设立分会场，四地同时上演欢庆活动。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有限开园仪式

7月7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网上预约系统对外开放，游客可以通过“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每天游客上限3000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4.33平方千米，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坝区4个片区。园内大面积保留和还原了湿地生态系统，内部林木葱翠、水系纵横、鹭鸟漫步，走进公园，宛如一幅笔墨清爽、疏密有致的山水画。目前有限开放的区域是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3.66平方千米。



2019 年侨界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7月9日,2019年侨界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以“聚焦资智融通、赋能杭港合作”为主题,聚焦杭港合作热潮,通过主论坛和“助力凤凰腾飞、香港上市融资——与港交所面对面”“杭港资本项目对接会”两个专项活动,围绕省、市提出的“凤凰行动计划”,搭建杭州与香港企业家、专业机构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努力创造条件,促成一批优质的浙江企业到香港上市,引进一批香港高端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到杭州发展。



2019 年之江杯全球人工智能大赛启动

7月16日,2019年之江杯全球人工智能大赛正式启动。此届大赛设创新赛和技术挑战赛两项赛程,其中创新赛包含“零样本目标检测”“行人多目标跟踪”“电商评论观点挖掘”三个赛题,技术挑战赛以“视频描述生成”为赛题。大赛以“以赛引才、以赛促研、以赛兴业”为基本思路,聚焦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产融结合”,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引领科技发展潮流。大赛将于8—9月举行初赛与复赛,10月在杭州举行决赛。



2019 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召开

7月11日,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峰会以“预见·音乐未来”为主题,200多位专家、学者和音乐企业领军人物参加,围绕“创新、智能、变革”“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保护”“数字音乐时代的人才培养”“中国音乐产业基地(园区)的建设发展”等议题进行探讨。峰会首次发布《2019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数字音乐产业发展专题报告》《2019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音乐科技与装备专题报告》,解读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音乐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政策,音乐产业专家顾问团队同时成立。



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

7月19—20日,“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成立大会暨2019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在杭州举行。这是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的第五次举办,适逢杭州爱乐乐团成立十周年,论坛由杭州爱乐乐团担任轮值主席。论坛致力于探讨目前受国内职业乐团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议题是“探讨符合我国乐团的发展标准和管理体系”。论坛期间,香港管弦乐团舞台经理陈国义被授予“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终身成就奖”。



2019 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杭州举行

7 月 21—22 日，2019 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工商界人士齐聚钱塘江畔，围绕“创造新产业繁荣的时代”，探索经济与创新发展的动力与路径。此届论坛着眼当下创新带来的巨变，围绕与新经济、新科技发展趋势相关的“5G 开启，智联万物”等九大议题进行。开幕当晚举行 2019 年 ABAC 第三次会议杭州市欢迎招待会。



2019 年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在杭州举行

7 月 26—28 日，2019 年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在杭州举行。大会围绕“中国英语教育：立足时代、融通中外”主题及核心素养教育、智能教育时代的教师发展、人工智能与外语教育等 12 个分议题举行系列活动，近 300 位中外知名英语教育专家、学者及大会优秀论文作者以主旨发言、专题研讨、工作坊、课例展示、论文宣读等形式，向与会教师展示中国英语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分享国际英语教育领域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以国际视野为中国英语教育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英语教育献策。



杭州主城区内钱塘江货运码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7 月 26 日，随着钱江港区钱江二桥下游货运码头杭州萧山宁围志达砂石场正式开工拆除，杭州主城区内钱塘江两岸再无码头存在，货运码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按照计划，8 月 10 日前，全部码头将彻底拆除完毕，届时，钱塘江主城区段货运码头将成为历史。随着《杭州港总体规划 2018—2035》的出台和实施，未来钱塘江沿线计划建设多座大型客运码头，钱江港区也由历史货运大港转型为以水路旅游服务业为主的“旅游港”，昔日繁忙的水运码头将重焕勃勃生机，为杭州“拥江发展”战略献上完美的答卷。



“非浙 A 急事通”措施实施

7 月 29 日，“非浙 A 急事通”措施在杭州正式落地实施。外埠人员如有到杭州就医、学习、开会、办事等需求，可通过提前申请，在早晚高峰时段进入“错峰限行”区域，一年内有 12 次申请机会。“非浙 A 急事通”措施的实施按照“提前报备、次数控制、急事通行”原则，非浙 A 号牌小型客车驾乘人员如需工作日高峰时段在杭州市“错峰限行”区域内通行的，可通过“浙里办”App、支付宝、杭州市公安局“警察叔叔”App 等平台的“非浙 A 急事通”模块，提供车牌、姓名及出行事由等信息申请报备，并取得电子通行凭证。



◆◆ 杭州市方志馆 7月参观集锦 ◆◆



7月4日，江苏省宜兴市档案史志馆馆长蒋宁鹏一行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考察并座谈交流



7月15日，由副主任王浩、段洪带队，贵州省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一行9人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并考察展馆建设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7月23日，浙江省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忠鸣一行4人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考察



7月24日，山东省邹平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明海一行13人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考察



7月25日，湖北省黄石市档案馆馆长江桂珍一行4人到杭州市方志馆参观考察

责任编辑：马琦敏



方志杭州 微信公众号



杭州市方志馆 微信公众号